

復旦 文史丛刊

朝鲜燕行使与 朝鲜通信使

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

[日] 夫马进 著
伍跃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朝鲜燕行使与 朝鲜通信使

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

[日] 夫马进 著
伍跃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鲜燕行使和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日)夫马进著;
伍跃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2

(复旦文史丛刊)

ISBN 978-7-5325-5683-0

I. ①朝... II. ①夫...②伍... III. ①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古代②朝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古代 IV. ①D829.312②D83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0134号

复旦文史丛刊

朝鲜燕行使和朝鲜通信使

——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

[日]夫马进 著

伍跃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4.25 插页 2 字数 338,000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

ISBN 978-7-5325-5683-0

K·1322 定价:58.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承印公司调换

“复旦文史丛刊”编纂说明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后,致力于推动有关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研究,近期重心是围绕着“从周边看中国”、“批评的中国学研究”、“交错的文化史”和“域外有关中国的文学资料与图像资料”、“宗教史、思想史与艺术史的综合研究”等课题进行探讨,同时,也鼓励其他相关文史领域的各类研究。为此,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出版这套“复旦文史丛刊”,丛刊不求系统与数量,唯希望能够呈现当前文史研究领域中的新材料、新取向、新视野和新思路,并特别愿意收录年轻学人的著作。

本丛书基本体例如下:

(一) 本丛刊收录有整体结构和完整内容的有关中国文史的研究专著,不收论文集。

(二) 本丛刊内所收专著,一般字数在25—40万字,个别情况可以超过此限。

(三) 接受国外以其他语言写成的专著的中文译本。

(四) 注释一律采用页下注,书后要有《引用文献目录》,如有《人名索引》和《书名索引》,则更为欢迎。

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

(五) 本丛刊设立匿名审稿制度,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聘请两位国内外学者担任匿名审稿者,如两位审稿者意见和结论彼此相左,则另请第三位审稿者审查。

(六) 本丛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负责编辑出版。

2008年5月

中文版序言

对于大多数的中国读者来说,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恐怕都是在阅读本书时才首次接触到的名词。燕行使是昔日朝鲜国王向北京派遣的、旨在履行朝贡义务的外交使节,而通信使则是朝鲜国王为了维持与日本之间的睦邻关系向日本派遣的使节。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朝鲜通信使是非常熟悉的,仅在书名中使用了“通信使”三字的书籍在日本便已出版了上百种之多。但是,在日本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在朝鲜时代曾经存在过被称为“燕行使”的外交使节、及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对前近代的韩国历史所发生的巨大影响。相比之下,对于当代的中国学者来说,恐怕很多人从未听说过上述两者。

本书的韩文版出版于2008年^[1]。该书韩文版的出版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个是由于东国大学教授郑台燮先生的建议。他在本书日文版原书尚未编辑的情况下,考虑到在韩国出版本书具有特别的意义,建议尽快翻译出版。另一个是由于我本人的希望。我也盼望该书能在韩国尽早出版。因为,利用燕行录的燕行使研究在韩国刚刚起步,值得瞩目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现。更重要的是,我在本书中阐述的关于通信使的见解与韩国的主流说法完全不同。所以,尽管本书的日文版尚未完成,我决定还

[1] 후마 스스무[夫马进]《연행사와 통신사[燕行使与通信使]》(首尔:新书苑,2008年)。

是要尽早地向韩国读者介绍我的想法。

本书的中文版与韩文版相比,增加了两篇论文。这次的出版也是由于两个原因。一个是由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先生的建议。另一个还是由于我本人的希望。因为我在撰写收录在此的各篇论文的时候,就一直期待着有一天能译成中文,呈献给广大的中国学者。

我希望将本书呈献给中国学者的理由,与呈献给韩国学者的理由,自有所不同。首先,中国学者对通信使问题应该并无先人之见,即“主流说法”。想呈献给他们的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当年朝鲜士大夫在中国旅行时所写的旅行记实在是太有意思了!中国的明清时期各类书籍大量涌现,可以称之为汗牛充栋。尽管如此,当时访问过中国的朝鲜人却记下了中国人通常不屑记录的内容。所以我想向学者们介绍这些史料的精彩之处。理由的第二是我希望中国的学者能够了解在近代前夜的东亚,即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的士大夫们讨论了什么问题,而且他们的精神和三国的学术究竟占有何种位置。

例如,在本书第八章中,我主要使用了朝鲜士大夫洪大容编辑的《乾淨衞笔谈》。如果有可能,我觉得应该逐条介绍该笔谈记录中的主要内容。因为在中国人留下的史料中,几乎找不到类似的记录。但是我在那一章中仅仅介绍了以下内容,即与这位朝鲜士大夫进行笔谈的两位中国士大夫多次热泪盈眶,呜咽不止,而且他本人后来也因受他们的影响而流泪。也就是说,我仅仅考察了他们的眼泪在东亚历史上所占有的位置。

当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得知他们的前辈在两百年以前是如此的多愁善感,无疑会感到惊讶。这种惊讶和有趣的程度应该超过作为日本人的笔者本人。现代的中国读书人应该都阅读过《红楼梦》。对于阅读过《红楼梦》的他们来说,都熟知林黛玉那“暗洒闲抛却为谁”的眼泪。但是,在《乾淨衞笔谈》中记录的眼泪汪汪的不是多愁善感的少女,而是饱读诗书的士大夫。面对中国士大夫泪流满面而感到惊讶的洪大容曾经规劝他们“欲泣则近于妇人”、“丈夫不须作凄苦语”。但是,慧眼的读者们一定可以联想到《乾淨衞笔谈》和《红楼梦》诞生于同一时代,两者之间应

该存在着某种意识上的共通之处。

我原来是以中国史,特别是中国明清社会史为研究方向的。我在此有必要告诉中国读者我为什么会注意燕行使,而且为什么我的关心会延伸到前来日本访问的通信使?同时要向中国读者说明,收录在本书中的各篇论文是在何种过程中撰写的?我觉得首先向中国的读者们介绍这些情况会有助于本书的阅读理解。

我对燕行使问题发生兴趣要上溯到1979年至1987年在富山大学工作期间。当时,我的同事、朝鲜目录学专家藤本幸夫先生告诉我,在《燕行录选集》(汉城: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1960—1962)中对中国的情况有十分详细的记载。我还上了他的韩语入门课,和年轻的学生们一起学习,打下了韩文的基础。但是,我当时埋头于中国善会善堂史和明清地方社会史的研究,没有时间仔细地阅读燕行录。

正式开始阅读燕行录是在1987年转到京都大学工作之后。首先阅读的燕行录是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引用的许筠《荷谷先生朝天记》和赵宪《朝天日记》。当时,为祝贺山根幸夫先生(已故)退休,计划出版纪念论文集。由于山根先生主要研究中国明代史,故该论文集被定名为《明代史论丛》。我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决定以想读而久未来得及阅读的燕行录为中心史料撰写明史论文。但是,面对浩如烟海的燕行录,究竟从哪里开始阅读呢?而且,以燕行录为基本史料是否可以写出明史的研究论文?那时,不仅在我周围找不到可以商量讨论的对象,即便是在日本的明史学界中也没有对燕行录表示关心的学者。现在,韩国和中国的学界对燕行录已经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从当年我开始研究燕行录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韩国学者和中国学者对此发生过兴趣。在这种状况下开始燕行录研究的我,可以称得上有些冒失。

但是,幸好当时购入的《국역연행록선집國譯燕行錄選集》第1册收录了已故黄元九教授撰写的《燕行录选集解题》。在这十分简单的书目提要中附有参考文献,其中包括了中村荣孝的《事大纪行目录》(原载《青丘学丛》第1号,1930)。我选定从哪一部燕行录开始阅读的方法实际上

非常简单,即根据上述中村荣孝的目录,在与“明代”有关的著作中选取同一次燕行中记载尽可能详细的燕行录,简单地说就是选择卷数最多的燕行录。这样,我首先阅读了许筠《荷谷先生朝天记》3卷、赵宪《朝天日记》3卷和赵宪《东还封事》。《荷谷先生朝天记》和《东还封事》收录在《국역연행록선집 國譯燕行錄選集》中,收录了《朝天日记》的赵宪《重峰集》是京都大学文学部所藏为数不多的朝鲜刊本书之一,由于长年的虫蛀,阅读时实在令人心酸不已。我就是以上述方法开始阅读燕行录的,现在看来也许有些略欠斟酌。

但是,命运是难以预测的。因为,如果说卷数较多的燕行录对中国的记载会十分详细的话,那么18世纪以后所写下的燕行录中有不少那样的作品。如果我当时仅仅是选择卷数多的燕行录,例如1887年李承五旅行记——《观华志》(12卷)的话,也许我的燕行录以及燕行使研究就难以深入,当然也不会将研究推进到通信使。在18世纪以后的燕行录中,单纯追求内容的详细和追求篇幅数量、缺乏新鲜感的作品很多,《观华志》就是其中之一。如果阅读了这类作品,不可能萌生对燕行使的兴趣。目前,在《燕行录选集》之外还出版了《燕行录全集》、《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篇》和《燕行录选集补遗》,史料状况与我开始研究时相比已经变得十分方便。我在本序文开始部分说过,希望能向中国广大读者介绍的燕行录是非常有意思的史料。但是,在此希望各位不要误解,并不是所有的燕行录都十分有意思。甚至不如说,如同本书第九章所指出的那样,几乎多半的燕行录都是辗转抄袭,屋上架屋,缺乏创见。对于有兴趣了解燕行录的读者来说,我建议首先从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洪大容《乾净斋笔谈》和朴趾源《热河日记》,或者许筠《荷谷先生朝天记》开始阅读。

1574年(宣祖七年、万历二年)踏上燕行旅途的许筠24岁,赵宪虽然比他年长,也不过31岁。我通过他们写下的旅行记并非仅仅品尝到了两位青年士大夫在海外旅行时体验到的欢喜,而且还感到了他们在旅行记中所表现出的对中华世界的强烈憧憬,以及他们对现实中的“中华”即明朝的愤慨,还看到了他们作为士大夫的忧虑和责任感。其中令我印象最

深的是他们那十分敏锐的观察意识的背后存在的“开朗”和“希望”。此后,我能够持之以恒地坚持燕行使的研究,与这一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章《万历二年朝鲜使节对“中华”国的批判》和第二章《赵宪〈东还封事〉中所见的中国情况报告》于1988年10月在京都召开的两个小规模研究会上相继发表。第三章《闵鼎重〈燕行日记〉中收录的〈王秀才问答〉》是1989年至1990年我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吃惊地获悉燕京图书馆藏有很多朝鲜版书籍之后,利用该馆所藏的一部朝鲜本写成的。为了撰写这篇文章,我从燕京图书馆借阅了吴晗辑录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显宗实录》和《肃宗实录》的部分,亦即大致相当于清朝康熙年间的部分。那时的我对中朝关系史仅有少得可怜的通史程度的知识,书中记载的事件和相关议论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惊讶接着一个惊讶。常言道,事实比小说更奇特。当时我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这些也加深了我对燕行使问题的关心。以上的三篇文章现在来看不免有些稚拙,由于类似的研究尚未出现,或者尽管已经出现了类似的研究,但我认为我在文章中对问题的观察角度比较新颖独到,故不揣冒昧仍将它们收录在本书中。

从1994年开始,我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了为期四年的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资助的大型研究计划——“冲绳历史情报的研究”。在六名优秀学者的鼎力合作之下,我组织了一个研究会,时间过得既有意义,又非常充实。作为该项目的研究成果报告书,我们完成了《使琉球録解題及び研究[使琉球録书目提要及其研究]》。由于该报告书得到好评,我们又在增补旧稿的基础上正式出版了《増訂使琉球録解題及び研究[増訂使琉球録解題及其研究]》。本书第十章《使琉球録与使朝鲜録》是按照以下思路完成的书目提要,即比较明清时期奉敕前往朝鲜和琉球的使节们所著的旅行记,进而在将两者作为比较对象的同时,着重调查、收集了前往朝鲜的中国使节的旅行记并对其作了说明。现在,随着本人研究的继续深入,发现了更多的使朝鲜録及相关书籍,感到有必要对旧稿再次进行某些增补。但是,我自信无论是韩国还是中国,至今均尚未出版超过本

书的使朝鲜录的书目及提要。在本书中,我根据在该论文完成后得知的一些新信息,作了相应的修订和补充。

随后我发表了收入本书第九章的论文《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书目提要》。2000年,我为了收集燕行录第一次访问了韩国。接着在2001年,应时任东国大学韩国文学研究所教授林基中先生邀请,与他一起编辑出版了《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史料的调查与收集完全由我一个人承担。该书中收录的燕行录都是手抄本,其中一些不仅没有明确的燕行年代,甚至连著者的名字也没有明确的记载。因此,我本人又独自考证了著者姓名和燕行年代,并建议在发行时附以相应说明。令人遗憾的是,该史料集最终没有向读者说明确定著者姓名和燕行年代的根据。有鉴于此,我认为说明相关根据是编辑者的责任与义务。而且,我还考虑到如果简要介绍该燕行录的内容,将会为今后利用该史料集的研究者提供较大的方便。但是,与林基中先生当初向我说明的计划完全相反,该史料集最终以“非卖品”的形式出版,未能公开发行。这样,就变得只有很少一部分研究者可以利用该书,为此我感到十分遗憾。该论文执笔时恰逢日本的某图书馆搬迁,结果有些图书未能寓目。日本现存的朝鲜燕行录尚有五部左右值得介绍,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完成这一工作。

在本书韩文版出版的时候,一些应该补充的内容采用了“补注”的形式。本书韩文版出版之后,韩国启明大学金荣镇副教授特意撰写了书评(《东洋史研究》,第67卷第4号,京都:东洋史研究会,2009),使著者获益匪浅。金荣镇先生虽然年纪尚轻,但却是韩国当之无愧的朝鲜时代目录版本学专家。在本书中,根据金荣镇先生的订正和补遗作了一些必要的修订。

在进行燕行使研究的同时,我也不得不从事自己的本行——中国明清史的研究。1990年代的前半期,在进行明清时代诉讼问题的研究时,我痛感欲将此类研究推向深入必须收集被称为“地方档案”的历史文书。于是,我向文部省申请了科学研究费,从1997年开始进行了为期3年的研究计划——“中国明清地方档案的研究”。申在植的《笔谭》是承担本

书中文版翻译的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教授伍跃先生在执行上述计划的合作研究中偶然发现的。当时,他于1998年前往山东省图书馆进行史料调查,他看到《笔谭》时觉得对我的研究也许是十分必要的,故收集了这一史料。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偶然,因为我同时也从事中国史的研究。当我阅读了这一史料之后,被其中清朝士大夫与朝鲜士大夫之间的学术争论,以及当时两国在学术上所处的不同位置及其含义所吸引,写下了构成本书第四章的论文《朝鲜燕行使申在植〈笔谭〉所见汉学与宋学的论争及其周边》。

我最初谈到燕行使与通信使之间的联系是在2001年12月7日于韩国东国大学召开的题为“燕行录与东亚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当时报告的题目是《燕行録と日本學研究(燕行录与日本学研究)》(载《韩国文学研究》第24辑,2001年)。但是,由于报告内容比较芜杂,并且我计划就报告中涉及的问题另外撰写论文,故未将该文收入本书。我在该报告中只不过通过燕行使和通信使的对比,尝试着将两者客体化和相对化。我在2002年11月30日由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主办的国际研讨会——“探询历史学的现状”——上作了题为“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1811年金善臣の通信行と1826年申在植の燕行を中心に——(朝鮮燕行使与朝鮮通信使——以1811年通信使金善臣的来日和1826年燕行使申在植的北京之行为中心)”的学术报告,报告的基本视点与上述论文相同。

但是,这种视点最终还是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我非常想知道前来日本的朝鲜通信使一行对当时日本流行的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提倡的“古学”的了解,即他们是通过何种途径、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了“古学”的。“驱使”我研究这一问题的是一位名叫金善臣的朝鲜士大夫。他于1811年以通信使的一员访问日本之后,1822年又以燕行使一员的身份前往中国。我越来越想知道,在他与清朝士大夫就汉学的是非问题进行学术争论之前,他对日本流行的反朱子学的学说,即古学究竟有多大程度的了解,或者说他是否曾经置身于能够了解日本学术动向的环境之中。在这

个意义上,我对通信使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燕行使研究的延续,而其开端则是申在植的《笔谭》。

我为了研究这一问题,在2003年和2004年集中阅读了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写下的与朝鲜通信使的笔谈记录。由此得到的知识与我在那之前从日本和韩国的通信使研究中所得到的“主流说法”是完全不同的。其结果使我认识到,燕行使和通信使并非仅仅是在相对化之后进行研究的两个被动的客体,而是可以更加积极地去衡量中国、朝鲜和日本之间在东亚世界整体的学术和文化方面所占地位的十分贵重的素材。具体说就是三者之间在哪些方面具有共同点,在哪些方面具有各自独特之处。前面谈到的出版本书中文版的第二个理由就在于此。本书第五章《朝鲜通信使对日本古学的认识——兼及朝鲜燕行使对清朝汉学的理解》以及以下的四篇均完成于这种认识的基础之上。

本书中文版除了在韩文版出版后撰写的第八章之外,还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了《越南如清使范芝香撰〈郿川使程诗集〉所见清代中国的汪喜孙》一文。2003年12月,我与其他六位学者一起前往越南首都河内探访史料。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调查收藏于汉喃研究院图书馆的“越南燕行录”。其间,我们前往越南国家大学访问,在该大学尚未整理的书库中翻阅《郿川使程诗集》时,偶然发现了汪喜孙的字——“汪孟慈”三字。在前面介绍过的申在植《笔谭》中,汪喜孙是登场的主要人物之一。我随后撰写了本文。现在,听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有计划将“越南燕行文献”编辑出版。考虑到本文采用的视点和方法将会对今后“越南燕行文献”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故将其收录在本书之中。

最初计划出版本书中文版时,我曾经设想过将关于明清时期中国王朝对东亚外交的其他三篇论文作为本书的第一部。这三篇论文是,《明清中国の対朝鮮外交における“礼”と“問罪”[明清时期中国对朝鲜外交中的“礼”和“问罪”]》(原载夫马进编《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中国东亚外交交流史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7),《明清中国による対朝鮮外交の鏡としての対ベトナム外交——冊封問題と“問罪

の師”を中心に[明清时期中国对朝鲜外交的一面镜子:对越南外交——以册封问题与“问罪之师”为中心]》(原载纪平英作编《グローバル化時代の人文学——対話と寛容の知を求めて[全球化时代的人文学——寻求对话与宽容的智慧]》[下],京都大学文学部创立百周年記念论文集,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7年、本文英文版:Ming-Qing China's Policy towards Vietnam as a Mirror of Its Policy towards Korea: With a Focus on the Question of Investiture and “Punitive Expeditions”,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No. 64, 2007),《一六〇九年、日本の琉球并合以降における中国・朝鮮の対琉球外交——東アジア四国における冊封、通信そして杜絶[1609年、日本合并琉球以后中国和朝鲜对琉球的外交——东亚四国之间的册封、通信及断绝]》(原载《朝鲜史研究会论文集》第46集,2008年,本文韩文版:《1609년 일본의 류큐 합병 이후 중국, 조선의 對 류큐 외교》,载《梨花史学研究》第37集,2008年)。当初收录这三篇论文的设想是,读者如果能首先了解东亚世界的外交和国际关系体系的话,将会有助于把握朝鲜燕行使和通信使的问题。但是,以后发现收录这三篇论文反而会让本书变得太过复杂,故忍痛割爱。

在本书出版之际,首先我想感谢葛兆光先生。葛兆光先生一直耐心地等待着本书的翻译工作。而且,当他向我建议出版本书的时候,还表示愿意介绍翻译。不过,我还是请伍跃先生担任了本书的翻译工作。因为,每当我完成一篇与燕行使和通信使有关的研究论文之后,伍跃先生都立即将其译成中文。从本书第三章发表之时开始,他就注意到中国学术界到目前为止尚无类似的研究,认为有翻译介绍的必要。但是,我本人的研究一直进展得很慢。从那时起的将近20年的时间里,伍跃先生十分耐心地等待着我的研究逐步推进到可以作出阶段性总结的今天。在此谨向葛兆光和伍跃两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我还想向两位中国的先生表示感谢。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原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何龄修先生。我与何龄修先生之间的交往长达20余年。至今忘不了1997年5月见面时,何先生向我赠送

了其于1988年发表的《〈柳如是别传〉读后》一文的复印件。该文是他在阅读陈寅恪的大作《柳如是别传》之后写下的“陈寅恪论”，我觉得是何先生所写的最好的论文之一。何先生当时还写下了一篇上百字的短简，其中谈到陈寅恪兴趣广泛，其研究涉及多个领域。这也是给我个人——在研究中国明清社会史之外还关注中国法制史问题或朝鲜燕行使问题——的激励。记得我在深感不安的同时，对何龄修先生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另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历史研究所所长陈祖武先生。2004年11月，我在写完收入本书第四章的《朝鲜燕行使申在植〈笔谭〉所见汉学与宋学的论争及其周边》之后，想进一步深入了解清朝汉学及其对朝鲜的影响。于是将伍跃先生刚刚翻译好的中文原稿先期寄给北京的陈祖武先生，之后当我去北京时即在此基础上请教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身任所长的陈先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在两个小时里和我就很多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最后，我衷心希望能够通过本书将朝鲜燕行录的价值所在，以及东亚三国士大夫之间展开的学术交流的重要意义传达给中国的广大读者。

夫马进

2009年4月11日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编辑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已经出版问世。本书附录中介绍的范芝香撰《郿川使程诗集》收录于该书的第15册。在此谨向编辑出版了这一重要文献集成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表示衷心的感谢。2010年10月15日追记。]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 1

第一部 十六七世纪燕行使对中国的观察

第一章 万历二年朝鲜使节对“中华”国的批判 / 3

- 一、引言 / 3
- 二、许篈和赵宪 / 5
- 三、“中华”的现实(一) / 8
- 四、“中华”的现实(二) / 12
- 五、结语 / 18

第二章 赵宪《东还封事》中所见的中国情况报告 / 22

- 一、引言 / 22
- 二、中国报告与实际的见闻(一) / 24
- 三、中国报告与实际的见闻(二) / 27
- 四、结语 / 29

第三章 闵鼎重《燕行日记》中收录的《王秀才问答》 / 32

- 一、引言 / 32
- 二、闵鼎重的中国旅行 / 34
- 三、对《王秀才问答》的分析 / 36
- 四、结语 / 45

第二部 十八九世纪燕行使与通信使进行的学术讨论与学术交流

第四章 朝鲜燕行使申在植《笔谭》所见汉学与宋学的论争及

其周边 / 49

- 一、引言 / 49
- 二、申在植和他的《笔谭》 / 53
- 三、汉宋之争 / 63

四、汉宋议论的周边 / 74

五、结语 / 84

第五章 朝鲜通信使对日本古学的认识

——兼及朝鲜燕行使对清朝汉学的理解 / 88

一、引言 / 88

二、往路：大坂以西的古学情报 / 91

三、在江户对古学认识的加深 / 98

四、返程再经大坂 / 105

五、结语 / 113

第六章 1764 年的朝鲜通信使与日本的徂徕学 / 117

一、引言 / 117

二、对徂徕学的进一步认识——以收集徂徕学著作为中心 / 120

三、对徂徕学派校勘学和重刊古代典籍认识的加深 / 127

四、朝鲜通信使归国后对徂徕学的介绍 / 132

五、笔谈记录中所见朝鲜通信使对徂徕学说的反应和评价 / 137

六、结语 / 142

第七章 朝鲜通信使与日本的典籍

——以古学派校勘学的著作和古典籍为中心 / 145

一、引言 / 145

二、1748 年朝鲜通信使与日本的典籍 / 145

三、1764 年朝鲜通信使与日本的典籍 / 149

四、日本典籍向朝鲜的流传 / 151

五、结语 / 154

第八章 1765 年洪大容的燕行与 1764 年朝鲜通信使

——以两者在中国和日本对“情”的体验为中心 / 158

一、引言 / 158

二、洪大容燕行的目的以及对国内的冲击 / 160

三、洪大容与通信使元重举等人对中国人和日本人
观察的类似性 / 168